

西方启蒙社会的价值危机与批判

——析霍克海默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的价值批判

许斗斗

[提 要] 启蒙运动曾是西方社会崛起的基础，对人类文明进步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启蒙运动也有许多致命的局限性，霍克海默对启蒙精神中知识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给予了深刻的批判，揭示其最终后果在于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否定。如何走出由启蒙所招致的世界灾难，杜维明先生的观点：超越启蒙心态，秉持儒学的“做人”之道，走向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是很有启发性的；同时本文主张，启蒙的实质在于批判，在于超越，在于实现人类社会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关键词] 启蒙精神 霍克海默 工具理性 价值 儒学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04)06-0033-07

“五四”运动是揭开中国现代史的启蒙运动，其中所开启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是作为反帝反封建、反旧传统思想的最有力的武器。回顾历史上的启蒙运动，继续提倡这两种精神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引介一些现代西方学者对启蒙运动的反思与批判，或许更能够借鉴、丰富和发展我们对原有这两种精神、特别是“科学”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生存危机表明，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时代仍然需要理论上的这种借鉴、反思和批判。本文以霍克海默对启蒙精神的批判性阐述来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警示。

一、启蒙精神的变异——一种价值危机

欧洲历史在经历了基督教神学漫长的黑暗统治之后，启蒙运动曾经是人类走出这一黑暗路程的必要手段。因此，在霍克海默看来，启蒙运动自始至终的目标就是祛除神话，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和以科学知识来代替幻想的运动。在以F·培根为代表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竭力倡导下，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旗帜下，知识、理性及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科学技术的作用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明显，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也已根深蒂固。的确，这一运动给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精神等各方面都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

然而，霍克海默认为：“这个彻底启蒙了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①。由此揭开了他对启蒙运动的深刻反思与批判。霍克海默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启蒙精神已逐渐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异所带来的危机与不幸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启蒙精神的数字化。针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当时响亮的口号，他认为，启蒙时代的知识理性虽然是人类优越性和自主性的突出表现，但那时的知识理性在本质上就是技术工具，它仅仅是一种方法、一种技术控制的方法、一种控制自然的方法。他说：“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即对他人劳动和资本的利用。培根认为，知识中‘存留着的’‘许多东西’，其本身也仅仅是一种工具”^②。这就是说，当人类把关注的目光从天国转向人间、从上帝转向人类自己的生活 and 存在时（这是启蒙运动的原本目的），人类自身所拥有的知识在根本上是一种技术工具的知识，是一种力图征服一切对象（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手段和技能。在这种知识技术的视野下，人们以技术拒斥着所有不可化约的一切对象，因而，寻求统一性和一致性始终是启蒙时代的一种追求或要求，不管其对象是如何和是什么，其中特别是自然界对象。而这种对对象统一性和一致性的苛求，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统治或控制。正如英国学者布洛克所说的：“培根在所有的学科中都摒弃传统，把一切都押在试验性科学上，认为这能把人从原罪的负担下解放出来，恢复他由于堕落而丧失的对自然的控制。”因此，以培根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在摒弃传统神话般的解释后，突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知识就是权力，就是统治自然对象的一种力量和象征，就是展现人类理性的一种手段和技能。于是，有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各式各样的形式被简化为位置安排，历史被简化为事实，事物被简化为物质。……形式逻辑成了统一科学的大学校，它为启蒙思想家们提供了这个世界可计算的公式。”特别是：“数学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③。

启蒙精神的这一特征就是数字化特征。它对人们思维方式的模式化和规范化影响有着难以估量的危害性。在这种数字化的视野下，计算成为唯一的思维过程，可否被计算成为对象是否实用，成为是否“存在”的唯一判断。世界在这整齐划一的知识力量中失去了原有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多样性，世界僵化了。自然界在这种计算中被强行纳入一种控制和统治中。而拥有这种数字化的计算思想方式的人们，在不断的计算中陷入一种对自然对象的更深程度的算计之中。人类的这种算计是把自然对象进一步地纳入自己整个的计划之中，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计算和预谋，因而自然对象进一步陷入更深层次的受控之中。因此，在启蒙运动的这种数字化的统一规划中，自然对象的被统治和被控制是一种典型的趋势。这就是霍克海默所揭示的启蒙运动的变异之一。

第二、启蒙精神的主观化。在启蒙运动中，古希腊罗马神话是人们当时战胜基督教神学的一种有力武器。人们在这些神话中不仅似乎看到了人自身的力量，而且借助这些神名和隐喻，特别是对神的命名与解释，人们表达着一种对自然对象和自然秩序的统治与控制欲望。之所以如此，霍克海默认为，这是因为：“启蒙总是把神人同形论当作神话的基础，并用主体来折射自然界。由此看来，超自然物，以及神灵鬼怪都是人们自身畏惧自然现象的镜像。因而，许许多多的神话任务都被赋予了一种共同特征，即被还原为人类主体。”“启蒙始终在神话中确认自身”^④。人们在这些神话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而这些众神们不仅代表着具体的各种事物，而且控制着这些具体的事物，如阿波罗代表着太阳，也支配着太阳；宙斯代表着宇宙，也控制着一切。人们借助神喻而表达着自己的愿望。于是，当众神在统治世界时从世界中分离出来，人类也就不知不觉地与世界对峙起来了；这样，在启蒙运动中，主体觉醒并迅速膨胀。

人与世界的分离成为启蒙运动的又一结果，它在哲学上的表现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以及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觉醒。这在近代认识论领域中对认识论的研究无疑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这种分离所带来的代价无疑也是惨痛的。霍克海默指出：“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⑥。在此，向我们揭示了，人类在神话和启蒙之下自然界成为客体所遭遇到的“客观性”操纵，也就是说，自然在变成纯粹客观性的同时，实际上是成为人类理性权力独裁与膨胀的受害对象，因为此时自然已经被人类看作外在的对象了。人类的这种“看作”，在他看来，就是启蒙“抽象”的结果。同时，在这种抽象中，主观的图式化倾向会在思维定势中获得“合理性”从而忽略这种主观性。于是，主观的图式化体系就会被当成事物本身了，并用这种图式来替代事物本身，也就是说，“看作”转化为“是”本身。

而且，在霍克海默看来，启蒙运动所造成的这种“纯粹的客观性”实质上是一种“主观性”，是人类表现自己主观化的一种工具，质言之，此处的“客观性”已经失去了与“主观性”相对应的内在规定性，而成为“主观性”的一种表现。这种“纯粹的客观性”只能在主客体相分离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而这种分离的直接后果是主体主观性的自我膨胀和肆意行动，是主观化的实施和绝对专制。这种“纯粹的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化冲动一旦爆发和实施，作为对象的自然界将遭掠夺，作为对象的人类自身将遭奴役。

第三、启蒙精神的虚无化。这里的“虚无”指的是人的存在价值被实质地抛弃。虽然启蒙运动把主体凸现作为一种存在，但这种存在是以主客体的分离为前提的，是以人与自然界、人与世界的分离和对峙为基础的，因而，其实质上是抽拔掉了人类价值存在的根基。这是霍克海默在对启蒙精神进行上述反思后所要进一步揭示的核心之处。

霍克海默认为，启蒙时代对技术理性的依赖和崇拜使人自身的价值存在和所追求的目标已经受到漠视和抛弃。“人们从自然中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此来全面统治自然和他人。这就是其唯一的目的。毫无疑问，不论其自身如何，启蒙抹除了其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⑦。在他看来，启蒙运动使人们失去了自我意识、失去了对意义的追求，而只是关注着从自然对象中的索取，因而，在总体上，人们也就是误解了自身存在的价值目标。同时对人类在具体价值存在过程和存在状态的误会中，霍克海默也给予了以下深刻的揭示，他指出，在启蒙的世界里，在技术理性统治的社会中，个人的存在过程受到了排斥，个人被贬低为一种零散的聚集物，个人的行为被机械地物化了，即：“凭借人生产及其文化的无穷动力，个体的常规行为方式表现为唯一的自然、体面和合理的行为方式。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他的标准就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适应他的职业的客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⑧。这就是说，在大生产及其这种生产基础上的文化的规范下，个人的行为只能以这种社会规范来判断，他的存在标准也只能以是否适应规范下的社会行为模式为依据。这就是启蒙世界中个人的存在状态，自我价值的存在在此丧失殆尽。

霍克海默还进一步揭示人们这种行为模式之后的深层思维方式上的根源。他说：“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上的安逸，统治也以更为沉稳的压榨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确定了人类的本能。想象力萎缩了”^⑨。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也就是说，正由于这思维上的萎缩，个人才失去了自我意识的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意识，才以技术社会的行为模式来约束和规范自己，才对一切支配人的权力麻木不仁和视而不见。但是，霍克海默则由此转向了对造成人们思维萎缩的原因的揭示与批判，他说：“社会的现实工作条件迫使劳动者墨守成规，迫使劳动者对诸如压迫人

民和逃避真理这样的事情麻木不仁。让劳动者们软弱无力，这不仅是统治者们的策略，而且也是竭力想摆脱本来命运、并且最后改变了本来命运的工业社会合乎逻辑的结果”^⑩。在他看来：“社会整体的经济决定方向已经控制了人类的身心构造，并且使那些能够促使人们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人器官发生萎缩”^⑪。因此，他批判了由启蒙起动所带来的技术工业社会对劳动者的整体压迫，即对启蒙运动后的技术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批判它对人的价值存在过程和存在状态的整体压制，批判它使人在这强行统一的“社会化”过程中成为彼此孤立的纯粹类的存在物，使社会与人的价值存在对立起来。

二、启蒙实质的价值批判

在强调人类知识理性的伟大作用中走向了一种招致灾难的路程，即在人为地树立起以自然界为“战斗”对象的观念的同时，又将自身的“战斗”工具——知识技术推崇为唯一的存在方式，乃至新的崇拜之“神”。这样，启蒙在祛除“神话”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神话”。

启蒙的新“神话”与其批判的旧“神话”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那就是：都不顾人类自身的存在目的，都丧失了人类自身的根本价值趋向和价值活动。当然，培根对旧传统的抛弃和对新科学的追求是必要的和进步的，但其中所蕴涵的危机后果却并未被当时的人们所觉悟。因此，霍克海默认为：由试验哲学之父的培根所倡导的科学启蒙精神，其危机在于：“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替代了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了原因和动机”^⑫。也就是说，人类在现代科学之路所放弃的是人类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此，霍克海默从以下九方面进行了实质性批判：

第一、知识的本质是技术。启蒙时代的历史特点使得启蒙活动本身、以及启蒙活动所借以进行和展开的工具——知识在初衷上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即面对神的世界，它要唤醒整个真实的世界，祛除神话，用知识来替代幻想，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人的自信与自主。因此，启蒙运动在本质上是进步的。然而，启蒙运动为何却又走向它的反面，这与当时的人们对知识看法的偏颇、以及由此而致的知识之发展的偏失有关。于是，霍克海默首先开始对知识的批判。

在他看来，启蒙时代的人们在走出神坛后的首先醒悟是，知识才是人类的优越性所在。是人类能够借以抗争强大的自然界的唯一手段。于是，知识就是力量。在盲然而强大的自然面前，知识才是人类显示自身之力量的唯一方法。然而，知识是什么？启蒙时代的人们明确地以现实的方式告诉了世人，这个答案就是霍克海默所说的：“技术就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即对他人劳动和资本的利用。培根认为，知识中‘存留着的’‘许多东西’，其本身也仅仅是一种工具：无线电就是一种精致的印刷术，轰炸机是一种更有威力的火炮，遥控系统则是更为可靠的指南针。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此来全面统治自然和他人。这就是其唯一的目的”^⑬可见，在启蒙时代，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是唯一可靠的知识，是知识的唯一本质。人类在此时的知识发展和追求中所显露的不再仅仅是对外在自然界的概念认识与图景反映，他们要在自然界的无规定性奴役面前显现出利用和统治的欲望。

应该说，启蒙时代把知识转化为人类的科学技术和工具，这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有相当的益处，它使得人类一定程度地摆脱了自然界的盲目奴役，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获得一种存在的秩序和心理的慰藉。但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却仅仅把自己变成了缺乏终极关怀的技术专家。他们只是突出了知识中的技术与工具，使之成为了唯一：他们把知识仅仅当作与自然界抗争和赌气

的手段和权力，仅仅在知识中展现自己统治的欲望。因而，在培根的《新工具》中，权力成了知识的同义词，即知识仅为“操作”自然界的“权力”。知识在被强烈地凸现出技术和工具的特征中走出了它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灿烂，陷入异化之中，在这其中，一切不可化约和计算的东西就被它所敌视和排斥。因此霍克海默认为，对启蒙时代的知识应该给予批判的就是：它丢失或抛弃了知识向人类展示自身之存在状态的真理，而错误地凸现出并使之成为唯一的人类统治欲的功能。

第二、工具理性与人的本体价值的消解。启蒙时代的知识是技术，技术的本质是工具，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是这个时代理性的总体化身。因而，当霍克海默指出：“启蒙是总体性的”时候，这其中就喻示了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在那个“理性时代”的绝对统治地位。在那个理性时代，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最终成为纯粹目的的工具。理性的技术化和工具化，其直接的恶果是什么？它又是如何使人们渐渐地放弃对生存意义的追求？

首先，霍克海默认为，在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上，一方面，工具是一种中介，它喻示着作用双方的分离和对峙。因此，在工具理性之思维方式中所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离和对峙。工具理性还体现出主体意志，体现出主体对客体的强制。另一方面，主体的自我意识在客观化的技术过程中又消失殆尽，人的主体性被技术和工具边缘化乃至抛弃，因为，它必须以技术和工具的实际效用为核心；数学步骤变成了思维方式：思想变成了物，变成了工具，它失去了往日的浪漫；想象力萎缩。“人发明了机器，但这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发明者的智力必须适应于更加精确地规定的任务，在这方面他的智力变得越来越象机器智能”¹⁴。

其次，在人的行为方式上，社会借助技术发展所赢得的时间也实际地规定和安排了人的行为方式，于是，人必须适应技术世界的运转，符合技术世界的节奏而生存。于是，人的社会化实际变成了人的技术化和人的工具化。人不再成为人自身了。人是通过他在社会中的具体作用或所扮演的具体角色等其他特征来表征自己。当然，霍克海默在此的批判决不是对人的社会角色的批判，因为人不可能不以某种社会角色而存在于社会之中。实际上，他是在批判人的片面性。

因此，最后，霍克海默以及整个法兰克福学派最为关心的是，在人的存在方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人的存在价值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表现在，人的存在被边缘化。“个人被贬低为习惯反映以及实际所需的行为发生的聚集物。泛神论使对象精神化，而工业化却把人的灵魂物化了。自然而然地，经济机构，甚至在全盘计划之前的经济机构，为商品设定了决定着人类行为的价值”¹⁵。也就是说，人被物化、被视为物；人类的行为价值是依照商品价值的设定而决定与判断的。这样，人的生活方式已不再是自觉的浪漫过程，而是一个被强制地、被技术社会化地指定过程。所以，霍克海默指出：“科学如果按照理性化的劳动方式来对待人们的经验世界，那么它就会消除人的本质特征，把人变成单纯的功能”¹⁶。同时，另一方面，人存在于无奈和孤独之中。由于理性的技术化，人的内在性由多样性变成为单一性；又由于技术的社会化，个人必须服从社会和团体的决定，个人变得更加孤独。人虽然能够战胜自然，却在自我面前丧失和失败，在社会中软弱无力。因此，在霍克海默看来，启蒙时代的理性的技术性异化，及其所导致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现象，其最终的恶果是造成人的存在价值的丧失。这才是他从事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批判的目的所在。

第三、工具理性与人的自主性丧失。霍克海默是赞成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把科学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生产力之一的观点，并指出：“就科学可以用作创造社会价值及科学生产方法这一点而论，

科学的确构成生产手段”¹⁷。但是，霍克海默认为，就本质而言，科学所追求的是真理，而这种真理是不能仅仅以社会效益来衡量或决定的。科学所获得的社会效益应该是科学追求真理过程中内在于科学的东西，它是不能作为科学之外的外在目的来追求的。科学所追求的真理是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美好的具有终极价值的方面。霍克海默的这种科学本质观无疑是非常精辟的。然而，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危机之根源在于：科学把外在的社会效益仅仅当作其自身的唯一目的，只是追求短期的实际利益，而对整个社会的宏观前途避而不谈，不作任何应有的理论思考。一句话，就是工具理性成为科学知识的核心，成为理性的本质。于是，“当关注更加美好的社会标准（这种标准在启蒙运动中仍然占主导地位）让位于去证明现存社会应是永恒不变的企图时，一种致命的消解的因素便渗入到科学当中。……科学的方法重视的是存在而非生成，一定的社会形式则被视为是以一种恒常不变的方式运转的机制”¹⁸。也就是说，当科学只是注重它对外在东西的“获得”时，它是不会关心这个东西的“生成”和“过程”的。因此，科学就只是短期效应，而不可能关心长期发展，不可能关心人类美好的长远未来。

这样，正如H·贡尼和·林古特所言：“因此，科学理性不能就人的生存问题说出什么来，不能从内容上对这些问题表示什么态度，不能从关心人类解放、指导人类认识的意义上来说明行动的目标。这样一来，在霍克海默看来，它就放弃了自己的自主权”¹⁹。那么，科学放弃自己所拥有的自主权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他看来，科学在放弃关乎人类生存问题的自主权后，自身所表现的是对客观外在事物的无关性和无视性，科学走向了工具性；思维本身也成为控制外在自然界的生产力，成为工业过程和工具实施的手段。而科学对自主权的放弃实际上是人对人自身之存在价值的放弃，人在技术世界里的存在已经无异于物的存在。人的异化是人的物化。因此可见，霍克海默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其实质也在于重新凸现人的存在价值。

三、启蒙精神中的启示

在人类历史上，启蒙运动是最具活力的一次运动。它是现代西方社会崛起的基础，也是现代社会进步与文明的起点；它所富有的批判精神是使人成为人的一个过程，尽管这种社会进步与文明，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已经受到一些智者的质疑和挑战。但是，由启蒙运动所导致的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实际惠利却是人类不愿放弃的，人类从中受益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在精神和心态上，启蒙运动也使人类充分感觉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万物的主人，人是世界改变的潜力所在。

但是，启蒙运动的这种精神和心态也有其深刻的负面效应，霍克海默的批判正是基此而生发出来的。他直接揭示了启蒙精神中知识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根本特性，以及这一特性对人类存在价值的根本危害；而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各种生态危机、人类生存危机也实际地证实了这种特性的根本危害。那么，如何走出这一阴影笼罩着的危机呢？对此，霍克海默并未提出实质性的建设性意见，而杜维明先生的观点则是富有启发性的。杜先生从现代全球意识的角度来看启蒙运动的局限性，或者说，在杜先生看来，启蒙运动的工具理性实际上是各个层次之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表现，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他指出：“启蒙运动明显缺乏共同体思想，更不用说全球共同体的思想。能否认识到这一点是精神联合行动的关键”²⁰。因此，他提出“超越启蒙心态”，而这种“超越”是建立在对人类三种精神资源的兼容并蓄基础上：第一种是现代西方的伦理、宗教传统，它促生了启蒙心态，因而对这种心态的超越必须源发出一些符合现代特性的新形态；第

二种主要是东南亚佛教、东亚儒学和道教，以及伊斯兰教等，特别是儒家超越的“做人”之道是杜先生着意强调的。他认为，儒家的“做人”之道就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人类宇宙观（anthropocosmic vision），实现“天人合一”，第三种是包括美国土著人的、夏威夷人的、毛利人等本土宗教传统，他们具有对“根”的深刻体验，他们意识到自己扎根在一个具体的地方，因而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细致的了解，体验到自己与自然整体的息息相关和互利互惠。这在杜先生看来也是具有现代启示的。

杜维明先生在“启蒙心态”上所提出的“超越”路径是很有启发性的，特别是儒家的“做人”思想和本土传统宗教对“根”的恋情。这些思想虽然在杜先生那里具有强烈的伦理情节，但笔者认为，它还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有如霍克海默所揭示的，启蒙运动的偏失在于科学主义的突出和人文主义的泯没，人从世界整体中分离出来，人以技术理性来征服并统治世界的欲望的膨胀，而儒家的“做人”之道正在于天地人的合一，这其中就包含着儒家把世界看作天地人合一的世界观理论；本土传统宗教对“根”的依恋也是这种类似世界观的表现。在这种世界观基础上的价值观必然是，人的存在价值决不是体现在对外界对象的掠夺和破坏上，而是展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中。霍克海默所批判的启蒙运动正是在凸现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过程中最终反而丧失了人类自己的存在价值，这说明启蒙运动存在着对人的存在价值的误解或曲解。

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²¹。因此，启蒙精神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超越的，它力图开启、澄清和照亮某种无明、晦暗和蒙蔽。因而，启蒙本身需要勇气和决心，需要有健全而坚强的智力和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那些无明、晦暗和蒙蔽之所在；福柯认为：“‘启蒙’既是人类集体参与的一个过程，也是个人从事的一种勇敢行为”²²。因而，启蒙是大家共同进行的未完成事业。启蒙表达了一种可能，它是对某种确定性的可能性批判；启蒙表现了一种超越，它是对种种既定限制的批判性超越；因而，启蒙还是一种历史的过程，它是对一切确定性和限制性的批判和超越的过程。这种批判性启蒙能够使人类历史在运动变迁过程中更趋合理和全面（既注重科学精神，又强调人文精神），使历史过程更趋人性和价值。“五四”运动已成为历史，但“五四”精神则需要我们在全面理解和科学、人文精神并重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唯有如此，这种精神在展开其历史性过程中才将历史成为人的全面发展史。

①②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43页、第44页、第47页、第46页、第49页、第44~45页、第66页、第73页、第74页、第153页、第145页、第44页、第247页、第66页、第74页、第158页、第160页。

③[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第74页。

④[德]H·贡尼、R·林古特：《霍克海默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5页。

⑤[美]杜维明：《超越启蒙心态》，《国外社会科学》

2001年第2期，第15页。

⑥[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页。

⑦《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530页。

作者简介：许斗斗，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福州 350002

[责任编辑 刘慧玲]